

秦汉之际的儒家思想

李国娟·著



秦汉之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由政治权力更替带来的思想文化的变化上。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转折：秦统一中国带来了第一次思想文化在转折，第二个转折发生在秦汉政权更替之际，武帝时期是思想文化变化的第三个转折期。三个不同的转折，统治者却面临相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巩固政权中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家作为统治思想已经被秦亡的历史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寻求新的能有利于政治上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是汉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秦汉之际的儒家思想

李国娟·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之际的儒家思想/李国娟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96-0303-9

I. ①秦… II. ①李… III. ①儒家—研究—秦汉时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4461 号

秦汉之际的儒家思想

著 者 / 李国娟

责任编辑 / 黄 勇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建工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960 1/16

字 数 / 210 千字

印 张 / 16

ISBN 978-7-5496-0303-9

定 价 / 35.00 元

前言

秦汉之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对此，清人赵翼作如是论断：“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劄记》卷二）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由政治权力更替带来的思想文化变化上。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转折：

秦统一中国带来了第一次思想文化大转折。公元前 221 年，是中国历史大段落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柳诒徵说：“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①秦始皇统一中国，功高盖世。《史记·秦始皇本纪》指出，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的建立，如何建立与之相一致的统治思想？或者说，如何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成了摆在秦始皇及其大臣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第二个转折发生在秦汉政权更替之际。秦任法而亡的历史事实给汉初统治者以深刻的警诫和反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不再重蹈秦亡的覆辙，汉初统治者自然就要反思秦速亡的经验教训。加上历经战乱而建立的汉政权面临着重重社会问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社中心，1988 年版，第 289 页。

人口锐减,人民流散,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混乱。在如此严峻形势下,统治者不得不思考究竟用什么样的理论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家作为统治思想已经被秦亡的历史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寻求新的能有利于政治上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是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武帝时期是思想文化变化的第三个转折期。汉初推行黄老之道,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统治策略为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就是最好的明证。《史记·平准书》中的如下记载也是后人所耳熟能详的:“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些的确表明,汉初选择黄老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是符合历史需要的。但是,黄老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未能持久,继文、景之后即位的汉武帝,就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诸侯日益坐大,豪强武断骄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势力日益膨胀的富商大贾,不仅“不佐国家之急”,反而依仗自己日益强大的势力,形成对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威胁。北方边境的匈奴侵扰也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这说明,黄老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继续沿用下去。改弦更张,寻求新的意识形态便成为汉武即位时的迫切需要。

三个不同的转折,统治者却面临三个几乎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巩固政权中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秦汉之际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历程:

秦统治者凭借在战国群雄争霸中一枝独秀的成功经验,在取得政权之后,按“惯性”仍然实施法家策略,并且在实际政治运行中,将法家思想推向极端而最终致使秦二世而亡。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一方面出于对秦政速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出于对战乱之后社会整饬的需要,

选择了黄老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黄老的无为而治让汉初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迎来“文景之治”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改弦更张，实现意识形态转型，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也从此确立了儒学在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的正统地位。

借助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很简要地描述出秦汉之间意识形态选择、建立以及转变的过程。但是，上述简要的概述显然无法揭示秦汉间意识形态演变的全部历程，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也显然未能穷尽所有方面。

如：在战国时期，推行法家思想让秦由弱而强，最终在群雄争霸中独占鳌头，兼并六国，实现统一大业。问题是，为什么秦统一六国之后，任法而治却迅速灭亡了呢？一般的解释是，法家的严刑峻法使秦政演变成“猛于虎”的苛政，不堪重压的农民终于奋起反抗，由此导致秦政的灭亡。但是，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秦政与法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上述论断所能涵盖的，秦政速亡与法家思想之间的关系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研究。

再如：秦二世而亡是汉初统治者始终牢记的深刻教训，因此，汉初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与反思秦政及法家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汉初统治者为什么在百家思想中偏偏选择了与法家思想有密切关联的黄老思想呢？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汉初意识形态选择及建立过程中，儒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叔孙通、陆贾、贾谊对汉初统治者的建议中，实际都包含着一个内容，那就是提醒统治者在政权建立后构建相应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问题是，为什么在儒生建议下，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不是儒家反而是黄老道家呢？概而言之，黄老为什么会成为汉初的意识形态？一个众所周知的理由是，汉政权建立在长久战乱之后，民不聊生，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黄老的“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但是，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汉初黄老之所以被立

为意识形态，显然不是上述一个简单的理由可以解释的。

还有：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时期。说明黄老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对汉初政权巩固是起到了有效作用的。但是，为什么汉武帝一登基，就试图改弦更张，试图实现意识形态由黄老到儒家的转变呢？

此外，过去已经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看法，认为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但是为什么到了昭帝时期还会有盐铁会议上广泛而激烈的儒法之争呢？而且，从《盐铁论》所记载的情形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大夫从法家立场出发，对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作了言辞激烈的贬斥，从辩论的局势看，御史大夫明显是占有上风的，这就令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秦任法而亡之后，尤其是在“独尊儒术”多年之后，法家思想及其势力还如此强大呢？

围绕这些问题，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跨出一小步，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能在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中获得一些有关意识形态选择、建立及转型的规律性认识的话，那就可以算是本书写作的实际意义了。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政权来讲，伴随着政权的更替与巩固，选择和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就会成为执政者不可避免的任务。

李国娟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秦朝：缺乏构建意识形态的自觉性	I
一、《吕氏春秋》构建意识形态的尝试被中断	3
二、秦缺乏意识形态构建自觉性的表现	15
三、意识形态的缺失与秦亡的宿命	25
第二章 汉初：儒道互动与意识形态转型	39
一、汉初意识形态构建的自觉与对秦政的反思	41
二、黄老之学与汉初意识形态选择	50
三、儒道互动与汉代意识形态的转型	68
第三章 “儒术独尊”与儒学意识形态的建立	85
一、“儒术独尊”的原因	87
二、“儒术独尊”的实质	104
三、汉代儒法之争的再度兴起	120
第四章 盐铁会议与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的考量	131
一、武帝晚年的政治危机与盐铁会议的召开	133

二、盐铁会议与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的考量	155
三、盐铁会议中的儒法之争	170
第五章 “霸王道杂之”与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的提升	199
一、盐铁会议后,儒学地位由形式上的独尊转为事实上的 独尊	201
二、盐铁会议后法家地位的嬗变	218
三、“霸王道杂之”与儒学意识形态的契合	226
主要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1

第一章

秦朝：缺乏构建意识形态的自觉性

一个统一王朝在政治上确立统治以后，除了要在经济上强固它的统治基础之外，还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构造其思想模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实现了从周代的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政治统一。但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仍然是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统治者不可能同时接受百家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只能在其中选择或整合几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然而，遗憾的是，秦统治者对这一点并不很明确，他们并没有完成这种选择。在意识形态的构建问题上，秦统治者在认识上是朦胧和不自觉的，在实践上也是缺乏作为的。

一、《吕氏春秋》构建意识形态的尝试被中断

《吕氏春秋》，这部由秦国著名政治家吕不韦组织手下三千门客编著而成的鸿篇巨著，被后人称为是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的书籍。该书内容宏富，是对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先秦诸子进行的一次系统整合，全书呈现出以儒道为主、兼摄名法的独特面貌。该书形成于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成定局之时，极富先见地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以分封为辅、集权为主的统一政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可以说，《吕氏春秋》是在政治大一统到来之前所做的一次思想大一统的努力，是一次意识形态构建的尝试。秦王朝建立后，对《吕氏春秋》的弃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构建问题上尚不具自觉性。

《吕氏春秋》的编撰动机：构建意识形态的尝试

吕不韦，身为秦相十余年，在秦国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秦统一六国的局面初现端倪之时，吕不韦就组织智囊团，主编《吕氏春秋》，其目的是要为秦统一天下及新王朝的长治久安作理论准备。

《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思想，内容庞大繁杂，《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并指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以长也。”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主编这样一部书呢？

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吕不韦是为了与四公子攀比并提高自己地位才编著《吕氏春秋》的。这个解释似乎并未能揭示吕不韦编著此书的全部动机。要了解吕不韦为什么会编撰《吕氏春秋》，我们仍要从时代背景入手分析。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思想上百家争鸣。到吕不韦时期，群雄争霸的局面已经渐进尾声，各国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趋势。那么，谁能成为这一历史趋势的实现者呢？就当时各国情况来看，秦国显然是最具可能性的。作为秦相的吕不韦，正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开始着手做好理论准备以迎接统一时代的到来。因为，伴随着国家逐渐由分裂走向统一，思想上也要求转变各家对立的局面以建立起与大一统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吕氏春秋》的出现，正是思想走向统一的先兆。

吕不韦此举，既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也是出于对秦国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清醒认识。对于秦国的命运，荀子曾说“其不及远矣”，原因是秦国“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荀子的预言的确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秦国的短处，即秦国是霸者的政治，而不是王者的政治。荀子还提出解决秦国隐患的办法是“力术止，义术行”（《荀子·强国》）。认为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已发展到顶峰，很难再发展下去了，关键是要转换国策，改为推行儒家的仁义之术才可以成就王者的政治。吕不韦执政十余年，自然对于秦国的这些隐患和缺点了然于胸。他希望秦统一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王

者之国。他组织人力编撰一部详尽而完备的书，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国家制定治国理论，乃至政策、方针和路线，是一次构建意识形态的尝试。

从《吕氏春秋》全书的内容来看，也确实是为君主立国治国所准备的纲要。全书共二十六卷，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计一百六十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有关如何治国，如何当好国君的共计一百一十二篇^①，占总数的70%；有关人生之道的有二十三篇^②，涉及军事与战争的七篇^③，关于音乐的有六篇^④，关于智慧的四篇^⑤，关于师道的三篇^⑥，关于自然与民俗的四篇^⑦。这样的分类虽然不能确保科学和精确，但是对于《吕氏春秋》全书内容的反映却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该书主要是为如何当好国君提供借鉴的。事实上，除一百一十二篇专门讲解君道的内容之外，其他的如战争、人生经验、音乐等篇目中，也都会涉及到君主如何修养自身，如何安邦治国，所以说，《吕氏春秋》的主旋律就是如何当国君，如何治理国家。该书虽然包涵的思想很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等等，都包容在内，但它并不是

-
- ① 此类内容篇目是：孟春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仲春纪、情欲、当染、季春纪、尽数、先己、论人、圆道、孟夏纪、用众、仲夏纪、侈乐、适音、季夏纪、孟秋纪、荡兵、仲秋纪、论威、季秋纪、顺民、知士、审己、孟冬纪、异用、仲冬纪、至忠、长见、仲冬纪、去尤、听言、谨听、孝行览、本味、首时、义赏、遇合、慎大览、劝勋、下贤、不广、贵因、察今、先识览、观世、知接、悔过、乐成、察微、去宥、正名、审分览、君守、任数、勿躬、知度、慎势、不二、执一、审应览、重言、精喻、离谓、淫辞、不屈、应言、具备、离俗览、高义、用民、适威、为欲、贵信、举难、恃君览、长利、知分、达郁、行论、骄恣、观表、开春论、察贤、期贤、审为、爱类、贵卒、求人、贵直论、直谏、知化、过理、雍塞、原乱、不拘论、赞能、自知、当赏、似顺论、有度、分职、处方、慎小、务大、上衣、任地、辩土、审时。共一百一十二篇。
- ② 此类内容篇目是：贵生、异宝、忠廉、当务、士节、介立、诚廉、不侵、务本、谕大、慎人、必己、报更、上德、召类、慎行论、无义、博志、贵当、别类、士容论、功名、顺悦。共二十三篇。
- ③ 此类内容篇目是：简选、决胜、爱士、长攻、振乱、禁塞、怀柔。
- ④ 此类内容篇目是：大乐、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
- ⑤ 此类内容篇目是：疑似、壹行、察传、精通。
- ⑥ 此类内容篇目是：劝学、尊师、诬徒。
- ⑦ 此类内容篇目有：有始览、应同、节丧、安死。（按：为简明起见，以上篇目均省略书名号。又，以上篇目数量为一百五十九篇。因其中《序意》一篇带有自序性质，无法归类，故少一篇。

一个杂凑的拼盘,而是有一个鲜明的中心贯穿全书。这个中心就是如何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吕氏春秋》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取舍各家学说的。《史记·始皇本纪》中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欲以并天下”才是《吕氏春秋》编撰的主要动机,是要为即将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提供治国纲领,是在新政权形式下建构新型意识形态的文化准备。

文化整合:《吕氏春秋》构建意识形态尝试的方法

既然吕不韦作书的动机是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大一统提供思想文化准备,那么他首先就要对先秦诸子思想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吕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吕不韦对先秦思想采取的态度是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整合态度,是从事了一种“文化统一”的工作。在吕氏看来“文化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前提之一,因此,在建构意识形态的尝试中,《吕氏春秋》采取的方法是对诸子文化进行整合。《吕氏春秋》也因此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胆突破各家学说界限,对前世文化中各家派别进行大规模整合与重构的巨作。

首先,《吕氏春秋》的文化统一之所以表现出对六国文化与学术主要采取融合与吸收的态度,是与秦文化底蕴的不足以及文化内涵的单薄有关的。这也正是文化力低下的部族在对文化力较高的民族在武力征服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及其通行的规则。由于秦长期处在关西边陲,被视为“戎、狄”之地,在文化传统上显然是无法与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深厚的齐鲁相提并论的。对此,《史记·六国表》曾作如此描述:秦“杂戎、翟之俗,先暴反,后仁义”,“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一直被称为“礼仪之邦”的齐鲁之地,在当时扮演着全国学术中心的角色。

如前所述,吕不韦对于秦国与齐鲁之间在文化地位上的这种落差是有所洞察的。秦的政治是强大的,挟“虎狼之师”,横扫六合,势不可

挡。但是，秦的文化弱势及其法家文化取向，却不容易得到被征服诸国的认同。也就是说，秦在完成军事统一的同时，面临着文化统一的挑战和困境。就具体的文化积淀以及学术、文化著作的成果而论，秦也显得捉襟见肘，根本无法和关东六国相提并论。在史籍（如《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书目中，明确标明是由秦国卿、相以及士人所写的作品为数很少，似乎也就是《商君书》、《秦诗》、《由余》、《秦谶》、《尸子》、《张子》、《吕氏春秋》等篇目。并且，这些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实用与技术方面，主要涉及兵家、法家、农事、历法、小学、占卜等：如《秦谶》系阴阳卜筮之书，《商君书》取自法家。这主要是和秦由来已久的农战论与功利观相一致的。相反，关东六国则人文藩滋，文学之士比肩。正视秦国与关东六国相比之下的文化弱势，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此举可以说是对即将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进行的一种文化“自立”行为。在这种文化“自立”中，吕不韦所倡导的是秦统一后在文化政策上要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文化整合，而非文化专制。

其次，《吕氏春秋》文化整合取向在该书的体例及内容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臧贵势，王廖贵先，兜良贵后”，可见，《吕氏春秋》对各家的长处和优点都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肯定。由此出发，《吕氏春秋》对各家的态度必然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用众篇》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实际是一语道破了《吕氏春秋》对待先秦各派思想的整合态度。正是本着这一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整合态度，《吕氏春秋》对于诸子思想多有援引，涉及道、法、儒、名、阴阳、兵、农诸家，其目的是要为即将到来的秦王朝奠定新的则天法地的“大圜”、“大矩”。与商韩“燔书”、“禁学”的文化专制对诸子思想所采取的否定态度不同，《吕氏春秋》对于诸子思想采取的是肯

定和吸收的态度。

对于《吕氏春秋》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文化整合立场,很多人都曾经论及。汉代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就曾指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这里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吕氏春秋》博采众家的特点,兼有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二是指明,各家思想在《吕氏春秋》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高诱看来,《吕氏春秋》是在以老子道家学说作为全书纲领的基础上,在人伦上吸收了儒家的忠义思想,在政治上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其中道家思想无疑是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后人对《吕氏春秋》中文化整合特征的论述,也基本是与高诱的观点一致的。许维通在《吕氏春秋集释》序中指出:“夫《吕览》之为书,纲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①强调了《吕氏春秋》博采众家的特点。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刘文典的《吕氏春秋集释》序中。刘文典说:“(吕书)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②钱穆也认为:“吕布韦著春秋,意在荟萃群言,牢笼众说,借政治之势力,定学术于一是。”^③

再次,《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各家思想的整合坚持了“扬弃”的态度。即使是被视为全书纲领的老子道家,《吕氏春秋》对其也是有所“扬弃”的。在吸收老子的大道观和法天地的思想的同时,摒弃了老子道家的“小国寡民”和“绝圣弃智”。对于儒家,《吕氏春秋》在吸收其封建宗法和仁义教化思想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不足:“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

①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页。

② 刘文典:《刘文典诗文存稿》,黄山书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③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65页。